

历代名著精选集

〔汉〕司马迁 著
张强 杜春龙 注评



史记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历代名著精选集

[汉] 司马迁 著
张强 杜春龙 注评

史记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西汉)司马迁著;张强,杜春龙注评. —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9.12

(历代名著精选集)

ISBN 978-7-80729-437-5

I. 史… II. ①司…②张…③杜… III. ①中国—古代史
纪传体②史记—注释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6825 号

- 书 名 史记
著 者 (西汉)司马迁 著 张强 杜春龙 注评
责任编辑 汪允善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1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jpm.cn>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 210037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2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437-5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85521756)

前言

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记之，言则右史记之。”由记言、记事而来的史学开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不过，真正给史学带来革命的是司马迁。在批判旧史学时，司马迁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为载体书写了史学的新篇章。在这场革命中，司马迁通过清算旧史学只关心“君举必书”的缺陷，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为逻辑起点，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承担考察社会运动的责任，编撰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与先秦时期的史学著作《尚书》、《春秋》、《左传》等相比，《史记》的意义是在冲破旧史学樊篱的同时，为新史学树立起高不可及的标杆。

为建立新史学秩序，司马迁以《史记》改变了以往的史述结构。具体地讲，一是以“本纪”为纲，以“世家”、“列传”为目，在丰富帝王政迹的基础上关注人事与社会运动变化的规律；二是创立“表”，通过大事记来联络和补充纪传，郑重地提出“表”记载的大事是历史进程中应关注的重点；三是通过分述天文、历法、兵律、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专门史，从新的视角提醒人们关注社会进程中容易忽视的方面。这三条拧结在一起，既承担了司马迁“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史学诉求，同时也为后世史学作出了体例上的规范。清人赵翼指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如果没有司马迁建立的新史学叙述秩序，中国的史学水平也许会停留在先秦阶段；如果没有《史记》，二十四史的体例很

可能是多元的,无法形成划一的文化格式和文化秩序。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史》中指出:“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史的前身是巫覡。女巫为巫,男巫为覡。巫覡是神职人员,负责氏族的祭祀活动。在神灵信仰盛行的年代,巫覡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桥梁。当人类无法解释山川万物枯荣生死的自然现象时,因相信万物有灵,于是创造了异己的世界即神祇世界。神祇世界出现以后,由谁来传达神进而是上帝的旨意呢?由谁来建立人与神之间的联系呢?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似乎无法找到一条通达的大道。然而,人是聪明的,在文化诉求的寻找中,他们把这一使命交给了巫覡。

早在人类守望神祇的年代,为了从人生此岸到达神祇彼岸,人类用自身的活动续写着神祇新篇,用文化描绘着神祇世界中的美妙。在他们看来,凡是现实世界没有的,神祇世界中肯定会有,而且肯定会比想象中的更加美好。既然神祇世界充满了期待,那么,就应该努力地寻找到达的途径。经过苦苦的求索,文化寻求的必然结果是创造出天梯神话。当天梯架起了人神交通的桥梁时,人类开始为取得的文化成果而欣喜鼓舞。遗憾的是,现实世界永远造不出通向神祇世界的天梯,上帝也永远不会为欢迎人类主动地放下天梯。尽管如此,寄托人类理想的神祇世界实在是太美丽了,美丽得让人心动。这样一来,人类需要用新的期待来填补失缺的文化心理。在这一过程中,最容易办到的只能是取之现存,通过巫覡来传达神的指示。

巫覡是神职人员,当他们振振有词地娱神祭神、自觉地为世俗政权服务时,因宣示君权神授,所以受到了君主的优待和重视。巫覡的称谓繁多。据《周礼》等先秦文献,巫覡有大祝、小祝、大史、小史、卜人、占人等称谓。祭神如神在,巫覡煞有其事的祭祀,一方面使宗教祭祀成为世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另一方面由宗教祭祀延伸出来的活动又不断地增添新的诉求。在这中间,巫覡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文化的传承者,经历了从巫覡到巫官,从巫官再到史官的历程。神职人员身份的变化是以文化诉求为先导的。或许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司马迁无可奈何地发出了“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哀叹。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充满了人文气息的年代。这一时期,六经摇身

一成为先王政典即先王留下的统治大法，当史官质问“君举必书”的格式并提出更高的文化追求时，六经自然要成为新史学的最高范本。“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是司马迁述史时的基本原则。“六艺”即六经，是指《诗》、《书》、《易》、《礼》、《乐》、《春秋》，“夫子”是指孔子。“六经”的提法初见于《庄子·天运》，起初，并不是儒家的专利，儒家只是在推崇孔子作《春秋》的过程中才把六经攫为己有的。如汉初，新道家陆贾在推明治国之理时，经常在高祖刘邦面前称说《诗》、《书》（《史记·酈生陆贾列传》）。又如汉初的官方哲学是黄老学说，但“好刑名之言”（《史记·儒林列传》）的汉文帝，已悄然地立一经博士，即《诗》学博士。这些情况均表明，六经显于汉朝与其有先王政典的品质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儒家重视传统和讲究师学与家学，当先秦诸子及后学表现出轻视文化传统的时候，儒家却通过师传和家传把六经捧为治道之理的法典。这种情况持续到汉武帝一朝——儒家战胜黄老学说成为一枝独秀的官方学说时，六经的阐释权已彻底地转移到儒家那里。在这一背景下，儒家以六经为先王政典的思维方式支配着司马迁的思想和行为，“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认为，在“论考之行事”（《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基础上撰写《史记》，以六经为史述的依据，是因为六经既是可信的文献资料，又是研究治道之理思想和灵魂。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以六经为最高范本的。六经在《史记》中的意义有三层：一是六经皆史，六经中有可信的史料。司马迁曾郑重地表示写作《史记》是为了“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史记·太史公自序》）。二是孔子的《春秋》本身就是一部专门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司马迁以《春秋》为师法的对象，包含了对其体例和格式的自觉学习。三是司马迁接受儒家的学说，将《春秋》视为高于一切的文化范本，将《春秋》“明道”视为史学发明的灵魂。其间，他以孔子激励自己，以孔子第二自居，一直在把自己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者，“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看来，“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史记·天官书》）是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周公与孔子之间的传递是文化统绪的传递，千年之后有谁能成为中国文化的直接传人呢？司马迁表示要像孔子

著《春秋》那样来建立震古烁今的功业，写出一部可以与《春秋》相比肩的《史记》。这就是说，《史记》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传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思想巨著。

六经是先王政典，是中国历代治民要术的经验总结。由于这样的原因，司马迁赋予《史记》的思想是，“罔（网）罗天下放失（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那里，撰写《史记》的任务是承担总结天下兴亡之理的责任。从这里出发，六经除了给司马迁提供了史料和严谨的治学方法外，还给他提供了研究天下兴衰之理的武器。换言之，司马迁对夏桀、商纣失国原因的探讨，对成汤、周武得天下之事迹的关注，都表现了他对历史兴亡的终极关怀以及他对现实政治的深邃思考。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史记》开创的新史学是在否定旧有的史官文化秩序中完成的。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的奇人，《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奇书。前人在论述《史记》的文化品质时，特别关注司马迁“爱奇”的特点。如汉代大学问家扬雄在《法言·君子篇》中指出：“子长多爱，爱奇也。”子长是司马迁的字，“爱奇”是说司马迁对奇异的事件即特别能展示人物精神面貌的事件有特别的兴趣。如陈涉受人雇佣耕种于田亩时，对累得七死八活的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意思是，如果今后富贵了，我们彼此都不要忘记。当有人嘲笑他的时候，陈涉长叹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豪情，陈涉才能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率先举起反抗暴秦的义旗。又如面对秦始皇出巡时浩大的声势，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其壮语为后来推翻暴秦的英勇业绩埋下了伏笔。再如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大搞逼供信，于是“连坐千馀家”、“流血十馀里”。按照古代刑律，立春后应停止刑杀，然而，这个嗜血成性的家伙竟气急败坏地大呼小叫：“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史记·酷吏列传》）像这样的情节或细节在《史记》中比比皆是，由于事件的选择与切入都十分老到，往往在三言两语中传神地勾勒出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形象。“爱奇”是一种品质，同时也是一种技巧，贯穿于《史记》之中，它对提高《史记》人物刻画的质量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问题是，这种“爱奇”的品质是从何而来的呢？具体地讲，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爱奇”与司马迁的家学有密切关系。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史官是中国各类文化典籍的实际掌握者。司马迁叙述其父司马谈所学时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临终时他拉住司马迁的手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继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因为这样的原因,司马迁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全面地掌握了一般人难以掌握的学问,同时历史著作的撰写也对司马迁提出了必须全面地占有资料的要求。这些就为司马迁日后的“爱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汉王朝的胜利实际上是楚文化的胜利。自楚文化走向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追求以后,它给西汉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使楚辞成为全国的唯一文学,进而诞生一种新的文体——汉赋,更重要的是,它把楚人的浪漫气质高扬为一个时代的风尚,既铸造了汉人的灵魂,同时也铸造了司马迁的浪漫情怀。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富有浪漫特质、充满奇特想像能力的《离骚》等既是楚辞的代表作品,同时也代表着楚文化的最高成果,从司马迁对屈赋的认识评价中不难体察楚文化对其“爱奇”品质的陶铸。

其三,承秦之弊,汉王朝到处是一派荒凉的景象。《汉书·食货志上》云:“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文景之治,汉王朝迎来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乃至出现了“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犂牛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汉书·食货志上》)的局面。社会经济的繁荣,不但增强了汉王朝的国力,而且还助长了汉人向外求索的豪气。这一时期,伴随着汉武帝打击匈奴、经营西域和经营西南夷的过程,汉人要求建功立业的雄心得到了有效地激发。可以说,整个社会都把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视为主旋律。在这种情势下,司马迁必然要融入雄奇阔大的时代潮流。

其四,为搜集资料,司马迁曾有三次壮游,行程达数万里,每到一处,司马迁细心地深入考察,接触了大量的奇人奇事。《史记》是一部有所本的史著,在写作中既需要以文献为依据,同时也需要印证文献的可靠性。三次壮游为司马迁进行文献与实地考察之间的相互印证打下了基础,使司马迁的史述更具有真实可靠性。如他叙述《五帝本纪》的材料来源时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軼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从司马迁的交待中可以看到两方面内容:一是使用史料时应持慎重的态度,应充分地考虑资料的可靠性。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应通过文献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的办法来进行取舍;二是疑古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印证文献是为了使史述更加真实可信。然而,壮游行程中采集的资料又丰富着人物的事迹和精神面貌,在这一背景下,文献与实地考察的成果互为补充,遂给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增添了新的异彩。

关注历史是为了现实,是为了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读《史记》不难发现,秦汉人物是司马迁关注的重点对象。文以载道,文章是思想的载体形式,那么,司马迁是如何记载和评价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呢?它又是如何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呢?主要有五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司马迁热切地关注秦得天下以后的风云变幻,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除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及治理天下的过程外,还把重点放在了揭示秦推行暴政的方面。这一内容不仅仅出现在《秦始皇本纪》中,还出现在《李斯列传》等篇中,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为了探讨秦失天下的原因,专门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贾谊总结秦亡天下的原因时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即秦统一六国后,没能及时地用仁义治天下是其失天下的原因;二是“危民易与为非”,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的结果是把全国人民推入火坑;三是“雍蔽之伤国也”(贾谊《过秦

论》),秦二世上台以后,继续推行暴政,结果是使本来已岌岌可危的政权更加雪上加霜。在《史记》中,司马迁虽然时常引用别人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但长篇大段地引用却只有《过秦论》一例。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贾谊的观点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贾谊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汉初一些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贾谊写《过秦论》之前,有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参见班固《汉书·贾山传》)探讨秦失天下的原因,贾谊的《过秦论》则带有集陆贾、贾山观点之大成的意味。关注历史是为了现实,这一点在贾谊那里十分明确。换言之,《过秦论》因其思想深刻,故司马迁在探讨秦失天下的原因时予以了必要的关注。第二,总结秦亡天下的原因是为了探究长治久安的问题。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地考察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是为了研究历史的变迁和帝王相承的大势。本着这一原则,司马迁试图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思考现实中的问题。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特别地注意观察秦汉间的变化大势,特别地注意总结秦亡的历史经验教训。

其二,司马迁纵横笔墨描绘了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行为举止和精神风貌。面对暴秦残酷的统治,陈涉与吴广商量道:“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寥寥数语,不但深入细致地交待出陈涉扯旗造反的原因,而且透过他的言语还深刻地揭示了“天下苦秦久矣”的态势。从陈涉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到刘邦建汉再度统一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天下大乱,各类人物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些出身不同的人汇聚到反秦起义的潮流中,其精神风貌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黥布早年曾受黥刑,然而,他不但没有意志消沉,反而以“当刑而王”(《史记·黥布列传》)一语相激励,从而迈出了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在汇入秦末大起义的各类人物中,他们既有像陈涉这样出身寒微的贫苦农民,也有像刘邦这样的市井游民、黥布那样的罪犯,还有像项羽那样的旧贵族。总之,群雄乘乱而起,虽然起义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推翻暴秦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为此,司马迁满怀激情地描绘了“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历史。为了肯定他们反抗暴秦的历史功绩,司马迁为他们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传记。极有意味的是,司马迁敢于“成一家之言”,不但把项羽的事迹写入了“本纪”,把陈涉写入“世家”,而且还根据他对历史的理解,为那些入汉以后遭到翦除的异姓王作

传,甚至掏出了一捧同情的泪水。这一切,都表现了司马迁敢于进行历史评判和价值评判的勇气和精神,以及他对历史独到的理解和认识。客观地讲,如果没有独立的文化品格和精神,那么,《史记》就不会具有深长的历史哲学的意味。

其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秦末之际,天下大乱,历史风云的变幻,使无数的王侯将相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与此同时,许多出身寒微的人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果我们将这些彼此之间有着一定联系的传记合在一起加以阅读,则会发现司马迁在记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隐于其中的正是他的史诗意识。所谓史诗意识是指司马迁在描述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一是强调秦统一中国后,天下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由于秦得天下以后,不能及时地调整政策,致使天下人心浮动。在这一大文化的历史背景中,秦以武力吞并六国,其冷酷给关东六国不同的社会群体留下了难以名状的创伤。“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谶语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六国反抗暴秦的意志和心声。为了真实地反映这一历史面貌,司马迁特别地关注六国反秦的思想情绪,充分注意描述他们的个体行为与时代要求的一致性。二是关注这一时期人物的英雄传奇性,仅以项羽为例,在反秦大起义的活动中,项羽所到之处无不披靡。特别是巨鹿一战,当诸侯畏于强秦不敢救赵时,是项羽力斩宋义,率部与秦军决一死战,从而给秦王朝以致命一击。“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惶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史记·项羽本纪》)在司马迁的精心描绘下,项羽成了反秦起义中最有生气的人物。宋代刘辰翁说:“叙巨鹿之战,踊跃振动,极羽平生。”(《班马异同评》)明代的茅坤也说:“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史记抄》)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注意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外,还十分注意通过人物的前后行为进行关照,以此来揭示人物命运的必然性。如在写项羽勇气可嘉的同时,司马迁还注意到了项羽有勇无谋而导致的悲剧性命运。项羽年轻时学书不成,又去学剑;学剑不成,又去学“万人敌”。然而“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因为有勇无谋,且缺少清醒的政治头脑,项羽失败

了。可见,司马迁十分注意用细节来大书特书历史人物的英雄传奇性。

其四,《史记》是一部以写人为主的历史著作。同时,司马迁又把它视为一部“通古今之变”的政要,这样,它给司马迁提出的要求是,必须透过人物的命运来深入地表达对历史的看法。因此,司马迁把解决“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视为了写作《史记》时的重要原则,在解决天与人关系的过程中,司马迁表现出对宗教神学的怀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对天命的否定,揭开了反抗暴秦的序幕。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感慨,司马迁以“身死东城,尚不觉寤(悟)而不自责,过矣”(《史记·项羽本纪》)之语进行了批判。当然,司马迁并不是非天命者,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表现出信奉天命的意绪,但他对人道的关心却是主要的。在处理“天道”与“人道”之间关系时,司马迁特别关心人物命运与社会构成之间的关系,其笔下的人物命运大都带有深长的人生哲理意味。即一个人的际遇和奋斗往往与他所处的时势相关,一些外在的因素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鉴于此,司马迁特别注意从大处着眼来关心思考这一问题。如身经百战的李广,一生都在追求着建功封侯的梦想,因时势不同始终难以实现,乃致汉文帝都替他感慨道:“惜乎,予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然而,萧何、曹参、陈平、樊哙、夏侯婴等人因赶上了好时光,虽然出身寒微,但自从随刘邦起兵以后,都建功封侯了。对此,司马迁深有感慨地说:“方其鼓刀屠狗卖羹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史记·樊酈滕灌列传》)

其五,《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历史著作,录入《史记》的又都是有个性的人物,由于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同,因此,其故事也就显示出各自的特质。如何把这些人物统一于“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之下呢?司马迁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以“本纪”编年,突出其纲要的地位,让其他四体围绕着这一编年的线索展开,进而在大的文化背景上突出时代的氛围。“本纪”在《史记》中的编年意义诚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本纪”是纲目,它串联起《史记》其他四体,展示了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这是司马迁在结构《史记》时显示出来的整体意志。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从发微六经入手,赋予“十二本纪”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的经学思

想。关于这点,我们从司马迁以《五帝本纪》为《史记》的开篇中就可得知。五帝的事迹很多,但司马迁把他们得天下的事迹定位在以德服天下的方面。这种理想政治经过司马迁的申明,演化为“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路线。以君德推及臣德,有德者昌的思想作为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贯穿于“世家”和“列传”的写作之中,特别是在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是无庸讳言的。

德在历史的发展中,初义与宗教神学相关,上古有“同心同德,同姓同德”之说,自周人发明了以德配天的思想以后,德在去除宗教神学外衣时具有了道德的内容和含义。德与仁的外化形式是仁与不仁的对峙,反映到秦末汉初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便成了司马迁进行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的基本观点,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格外地关注秦汉之际的大势,试图在忠实地描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事迹的时候,以思想观念的先行性对他们的个人行为作出不同程度的肯定和否定。

上述五个方面,是司马迁关注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所把握的价值尺度,其总的思想方法是以六经为逻辑起点,贯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思想。可以说,没有比读《史记》更激动人心的了,在司马迁的精心选择下,那一个个的历史人物无不写得龙打虎跳,读之,让人不得不佩服司马迁的才情。

杜春龙是我的学生,这本书是我与他共同完成的。合作总要先分清责任,两人的分工是这样的:我先请人输录,然后杜春龙给大部分篇目加注,再由我审读和作全面的改写,随后写出全部评析文字。这是一个复杂而繁重的工作。首先,杜春龙是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由他承担注释这一基础性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我回看注释文稿时,不得不逐一地作出改正和补充。从这一角度看,书稿中的错误和疏漏自然由我承担。

《史记》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在前人的选本中,通常只选“本纪”、“世家”、“列传”三体。针对这一情况,本书有意识地选了五体,其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在有限的篇幅内能看到《史记》的全貌。这一做法是否稳妥,有待于进一步地检验。

张 强

2009年3月8日

目 录	
前言·····	1
秦始皇本纪·····	1
项羽本纪·····	39
秦楚之际月表序·····	69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73
河渠书·····	78
吴太伯世家·····	88
越王句践世家·····	105
陈涉世家·····	121
萧相国世家·····	130
留侯世家·····	137
伯夷列传·····	150
孙子吴起列传·····	157
苏秦列传·····	165
魏公子列传·····	195
廉颇蔺相如列传·····	205
田单列传·····	219
吕不韦列传·····	226
李斯列传·····	234
淮阴侯列传·····	260
万石张叔列传·····	277



魏其武安侯列传	288
李将军列传	304
游侠列传	315
附录 报任少卿书	326

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①。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②。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③。及生，名为政，姓赵氏^④。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

【注释】

① 秦庄襄王：名子楚。孝文王之子，前 249—前 247 年在位。② 质子：古代派往别处或别国去作抵押的人质。多为王子或世子。吕不韦：阳翟（今河南禹州）的大商人，因拥立庄襄王有功，担任秦丞相，封文信侯。后辅佐秦王嬴政登基，被尊为相国。前 237 年，因嫪毐事件获罪，前 235 年饮鸩自杀。③ 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 259 年。邯郸：赵国国都，在今河北邯郸。④ 姓赵氏：秦，嬴姓。秦、赵同祖，周穆王曾以赵城封其族人造父，故造父一支以赵为氏。姓是族号，氏是姓的分支。

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①。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③。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④，蒙骜、王龁、麃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⑤。

【注释】

① 巴：古国名，在今四川、重庆东部。秦置巴郡，郡治江州（今重庆）。蜀：古国名，在今四川中部及西部。秦置蜀郡，郡治成都（今四川成都）。汉中：今陕西秦岭以南地区。秦置汉中郡，郡治南郑，在今陕西南郑。宛：楚地，后被秦侵占。南阳郡郡治（今河南南阳）所在地。郢：战国时期的楚国都城，此指湖北荆州江陵西北的纪南城。公元前 278 年秦军攻破郢都，置南郡，郡治郢城（今湖北江陵东）。② 上郡：原属魏。秦郡名，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河东：原属魏。秦郡名，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太原：原属赵。秦郡名，郡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

上党：原分属韩、赵。秦郡名，郡治长治（今山西长治西）。③ 荥阳：原属韩。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荥阳东北。二周：此指战国时的东周和西周，分别于前 256 年和前 249 年为秦昭王和秦庄襄王所灭。三川郡：秦郡名，郡治洛阳（今河南洛阳东）。④ 舍人：官名，太子属官。⑤ 委：托付。

晋阳反，元年^①，将军蒙骜击定之。二年，庶公将卒攻卷^②，斩首三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王齕死。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暘、有诡^③。岁大饥。四年，拔暘、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④。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⑤。取二十城，初置东郡^⑥。冬雷^⑦。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⑧。秦出兵，五国兵罢。拔卫，迫东郡^⑨。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⑩。七年，彗星先出东方^⑪，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将军骜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⑫。夏太后死^⑬。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⑭。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鶒反，戮其尸^⑯。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⑰。

【注 释】

① 元年：公元前 246 年。② 卷：魏县名，今河南原阳西。③ 暘、有诡：魏县名，其地不详。④ 内粟：向国家交纳粮食。内，同“纳”。石：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拜爵：授予爵位。⑤ 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皆魏县名。酸枣，在今河南延津西南。燕，在今河南延津东北。虚，在今河南延津东。长平，在今河南西华东北。雍丘，在今河南杞县。山阳，在今河南焦作东。拔：攻取。⑥ 东郡：秦郡名，郡治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⑦ 冬雷：冬天打雷。古人认为，发生异常的自然灾害与政治失察或不清明相关，需要引起警觉并应及时反省，以纠正不当的行为。⑧ 寿陵：秦孝文王陵墓。本为赵邑，故址在今河北正定南。⑨ 迫：逼近。⑩ 支属：亲属。野王：地名，在今河南沁阳一带。河内：魏郡名，郡治在今河南武陟。⑪ 彗星：俗称扫把星，古人认为出现彗星是不祥之兆。⑫ 龙、孤、庆都：皆赵县名。龙、孤在今河北行唐一带。庆都在今河